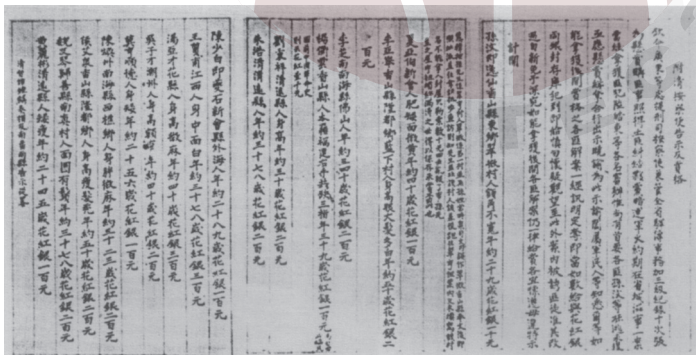


流亡中矢志不移

一、避難日本，遠奔美洲

廣州起義失敗後，清朝政府瘋狂捉拿革命黨人。廣州城內外及南海、番禺等縣，遍貼兩廣總督譚鐘麟緝拿革命者的告示，並分別懸賞花紅銀一千元或數百元，通緝孫中山、楊衢雲、鄭士良等人。

孫中山臨危不懼，他在十月二十六日鎮定地遣散了前來參加起義的隊伍，把起義用的名冊、檄文燒掉，短槍等物拋入井底，隱匿在廣州城內王煜初家中。兩天後，鑒於敵人搜索嚴密，便於二十七日夜裡機智地化裝成商人，「租到一艘小船，經順德駛到香山唐家灣，坐轎子到澳門，再從澳門搭船到香港」。這樣，走彎彎曲曲的小水道，躲過敵人的盤查，兜了一個大圈子，費去兩天時間，終於逃脫了



清政府緝拿孫中山等人的《清按察使告示及賞格》。

清政府的魔掌。

孫中山於二十九日到達香港，與先期逃到那裡的鄭士良、陳少白等人會合。但是，當時港英當局與清政府勾結，宣佈兩年內禁止孫中山等人登港入境。他們聽從達尼思律師「趕快離開香港」的勸告，當即在十一月二日晨搭乘日本貨輪「廣島丸」東渡，遠避日本。

與此同時，楊衢雲、鄧蔭南等也先後出逃避難。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在廣東經營的一切喪失殆盡，革命進入了「最艱難困苦之時代」。

從此時起，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前後有十六年之久，孫中山一直流亡在國外。他繼續為拯救祖國四處奔波，並殫精竭慮地進行了忘我的艱苦鬥爭。

孫中山和陳少白、鄭士良三人所乘的「廣島丸」，是一條只有四個倉位的貨船。它剛一駛出港口，便遭遇大風，途中一再拖延，經過近八天的時間，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日才到達日本神戶。一上岸就見當地日本報紙以醒目的字體，赫然登載著「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的消息。陳少白以示孫中山說：「我們起義為造反，日人名曰革命？何哉？」



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香港結識日本人梅屋莊吉，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圖為梅屋莊吉照。

孫中山應聲撫掌曰：「好！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他並加說明道：「『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此與吾輩排滿宗旨相符，即以稱吾黨可也。」從此，革命二字就為黨人所沿用。

初到日本，孫中山人地生疏，處境十分困難。據陳少白回憶，他們在神戶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去了橫濱，但一個人都不認識。後來孫中山想起他認識一個在橫濱開服裝店名叫譚發的華僑，找到譚發後，三個人才找了一間六席大的小房間住下。過了一兩天，經譚發介紹，孫中山結識了當地文經印刷店店主馮鏡如等人。

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一書中追憶說：「乙未余隨父居橫濱，時年十四。一日，見有久未剃頭之長衫客二人來訪余父（按：即馮鏡如），謂有密事相談，良久始出。後乃知來客為孫總理、陳少白。」這是很生動的寫照，如實地描繪出了孫中山初次流亡日本時的情景。

由於馮鏡如的協助，孫中山等得以在橫濱居留，他們在當地華僑中宣傳反清革命，發展興中會組織。同年十一月底，橫濱華僑十餘人在孫中山指導下組成了興中會橫濱分會，眾舉馮鏡如為會長，趙明樂為管庫，趙嶧琴為書記，馮紫珊為幹事。半月後，設會所於山下町一七五番，又有馮懋龍（後易名自由）、溫芬等十餘人入會。⁶他們將孫中山帶來的《揚州十日紀》和黃梨洲所著《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兩篇予以刊印，作為鼓動反清革

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六年版，第十五頁。

命的宣傳品，散發給海外各埠的華僑。

當孫中山在橫濱進行革命活動時，中日和議已成，兩國恢復了外交關係，清政府駐日公使即將入境，外間又盛傳日本政府將把革命黨人引渡給清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鑒於在日本的革命活動一時很難發展，決定與鄭士良、陳少白分頭活動，他命鄭士良回國收拾餘眾，靜待時機，以謀捲土重來，再圖起事；陳少白暫留日本，進行考察日本國情和結交朝野友人的活動；自己則準備遠奔美洲，重去檀香山，繼續在該地華僑中開展革命活動。孫中山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孫中山在橫濱剪去拖在腦後的髮辮，脫下長



興中會員秘密從事反清活動、吸收新會員的宣傳物——《揚州十日紀》、《嘉定屠城紀略》和《蘇城紀變》。

袍，改穿了西裝，拋棄清朝的打扮，表示自己決心與清政府鬥爭到底。但這時旅費匱乏，難以成行，後來幸得馮鏡如兄弟慨然捐贈一部分，又得梅屋莊吉從香港匯款一千三百美元，解決了問題。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一月，孫中山隻身抵達檀香山。他向孫眉詳述了廣州起義失敗的經過。孫眉說：「這不算一回事，還應繼續幹下去！」哥哥的安慰和鼓勵，使孫中山增加了繼續奮鬥的勇氣。在檀香山期間，他在《檀山新報》（《隆記報》）報館設立了興中會聯絡處，並組織興中會員進行軍事訓練，聘請丹麥籍軍官柏奇擔任教官，為革命訓練軍事人才。當時參加訓練的有鄭金、陸燦等十數人。但是因為革命剛剛失敗，清朝駐各地使節又對華僑大肆恫嚇，因此，就連興中會員也大多不敢和他往來，工作開展不易，雖歷時數月，革命活動進行遲滯。他看到美洲大陸的華僑遠比檀香山的多，於是便決定渡海赴美，前去開展宣傳鼓動工作，以擴大興中會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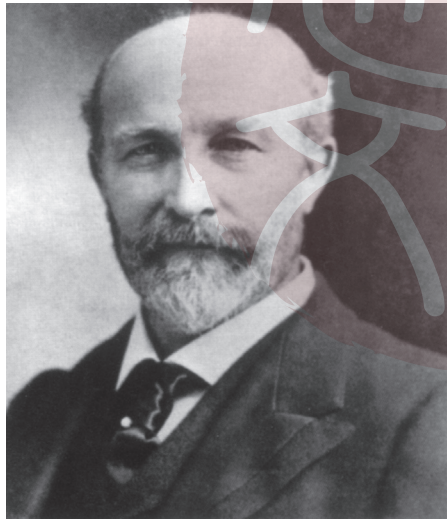
在動身的前一天，孫中山漫步檀香山街頭。這裡氣候溫和，樹木蔥蘢，奇花爛漫，四周碧波浩蕩，風景異常美麗。當孫中山正在欣賞四周的熱帶景色時，突然



一八九六年六月，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留影。此照片後被康德黎提交英國警探辨認，以營救孫中山。

一輛載著數人的馬車迎面奔馳而來。孫中山仔細一看，車上的人竟是他的老師康德黎夫婦和隨員。「他鄉遇故知」，孫中山喜從天降，忘卻了禮儀，立即用矯健的步法迅疾跳上馬車的踏板。這一意外舉動，使康德黎夫婦嚇了一跳，還以為這位「不速之客」是攔路搶劫的暴徒。孫中山滿臉是笑地操著英語問候說：「老師，您好！我是孫逸仙。」康德黎夫婦定眼一看，面前這個短髮改裝並留了鬍鬚的人果然是學生孫逸仙，立即轉驚為喜，大笑著和他熱情握手。原來，康德黎夫婦是在休假歸國途中順便在檀島登岸觀光的。師生分別已有半年多了，這次不期而遇，都是喜出望外。孫中山熱情地引導他們遊覽了島上的風光，並報告了自己將啟程赴美再轉英國的計畫。臨別時，康德黎夫婦留下了自己在倫敦的住址，並約定孫中山日後到英國時歡聚。孫中山當時並沒有想到，幸虧有了這次巧遇，日後他在倫敦才得以死裡逃生，躲過殺身大禍。

送別康德黎老師的次日，孫中山即登輪赴美。他在同年六月十八日抵達美國舊金山。舊金山華僑人數頗多，而且集中，但革命風氣不盛，視革命行動為大逆不道，願贊助革命的甚少。孫中山在舊金山住了一個多月，便乘火車東行，



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孫中山流亡英國倫敦後，即到他的老師、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家做客。圖為康德黎博士照。

途經沙加緬度、芝加哥等城市，橫過美洲大陸，到了大西洋西岸的紐約。所到之處，凡華僑較多的地方，即停留數日或十數日，進行革命宣傳，告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然而，得到的結果卻是「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數人而已」⁷。後來，與洪門會（天地會的別稱，是反清復明的一種組織，在國內是秘密會黨）人士有所接洽，不僅收效不大，而且成績更差。

孫中山的美洲之行，歷時三個月，使他強烈感受到華僑「風氣未開」，政治意識很是淡漠，奔波的結果「不過為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之前途」。於是，在同年九月，孫中山決定橫渡大西洋，轉往英國和歐洲大陸，去對那裡的華僑進行革命宣傳。

二、倫敦蒙難

孫中山流亡海外，清政府卻未就此甘休，他們視孫中山為「叛逆要犯」，一面派出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門、新加坡一帶「購線跟蹤」（即收買叛徒進行跟蹤），設法逮捕；一面由總理衙門通令駐亞、美、歐洲各國駐外使節，緊密跟蹤，相機擒拿，千方百計要把他緝拿回國處置。他們甚至救助於書法上的把戲，不惜在「孫文」的「文」字邊上加了「」旁，變成「孫汶」，企圖把孫中山說成是「貨真價實」的山角水涯的草賊。清政府駐英公使館還特此雇了碧

眼高鼻的外國偵探，偵察孫中山的行蹤。當時還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的孫中山到達倫敦不久，就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清使館綁架他的事件。

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孫中山自美國紐約到達英國倫敦，住在赫胥旅館。次日上午，他去覃文省街拜訪了老師康德黎夫婦，並轉移在葛蘭旅店住下。旋又去訪晤了也曾任西醫書院工作過的英籍教師孟生（Manson，原西醫書院首任教務長）。此後幾天，過著悠閒自得日子的孫中山或上街，或遊覽博物院或參觀古跡，或瞭解英國的風土人情，他毫未覺察到自己一到倫敦就陷於危險境地，一張黑網正在悄無聲息地朝他撒來。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半，孫中山從葛蘭旅店住所出來，準備再去康德黎家探望。這天正是星期日，旅店附近比較清靜，行人稀稀落落。他在路上，被早已窺伺在那裡的使館人員鄧廷鏗等三人糾纏住，他們裝出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以認同鄉為名，推推拉拉，要孫中山到他們家「吃茶」。忽然，路旁一幢房屋的門打開了，孫中山被左右兩人挾持進去，大門旋即被關閉，並插上了鐵鎖。就這樣，孫中山被強行綁架到波蘭德廣場（Portland Place）的清朝政府駐英公使館，陷入囚籠。清駐英公使龔照瑗以七千英鎊的高價，向格來輪船公司雇了一艘二千噸的輪船，造了一隻木箱，陰謀把孫中山裝在箱內，在幾天後秘密地運回國內處以極刑。這就是有名的「倫敦蒙難」事件。

倫敦蒙難（胡振宇畫）孫中山到倫敦十餘日後，被清廷駐英使館人員認出，遭誘騙拘捕，囚禁在公使館三樓。設計誘捕孫中山的主謀者之一，是英國人馬格里（H. Macartney）。這個人當時充當清朝政府駐英公使館的二等參贊，秘密進行偵察孫中山行蹤的「司賴特偵探社」

就是經他手雇定的。他們把孫中山幽禁在使館三樓的一個房間裡，窗戶上裝有鐵柵，門外加鎖，又有專人日夜看守，和外界完全失去聯繫。由於看守很嚴，孫中山想了很多辦法，如多次將托求友人營救的密信揉成一團用力扔出窗外，期盼有人拾起後幫他送出去，但每次都被看守發現，無法送出去一點資訊。經過苦苦的思索，他終於想出了一個有可能獲得成功的辦法。

十月十六日，當清潔工英國人柯爾（G. Cole）到房間進行清掃時，孫中山以懇切的心情向他低聲簡述了自己的經歷和將要面臨的厄運，請求他幫助搭救自己。孫中山的話打動了柯爾，他答應孫中山的請求，暗中把孫中山求救的信送到康德黎手中。與此同時，使館女工英國人賀維（Howe）很同情孫中山的遭遇，將孫中山被關押的消息也告訴了康德黎。

康德黎聞訊後，立即去找了孟生，一起商量如何搭救。他們四處奔走，積極設法營救。二人跑到英國外務部和倫敦員警署，要求政府干預這樁公然違反外交慣例的事情；又去了倫敦《泰晤士報》等，請求輿論伸張正義；還雇了兩名私家偵探在使館門前日夜監視，提防清使館秘密偷運孫中山回國。並到清政府駐英公使館當面交涉，而龔照瑗等都裝聾作啞，狡猾地矢口否認有這件事，硬說：「這裡根本沒有這麼一個人。」康德黎幾次去找馬格里，馬格里拒不見面，回答說：「不在家。」於是，他們再次呼籲輿論的干預。

到了二十一日，《地球報》（[The Globe]）通過採訪，以顯著的標題「可驚可駭之新聞：革命家被誘禁於倫敦，公使館的囚囚」作了報導，首先發表了清使館非法綁架本國革命黨領袖的消息。其他各報相繼轉載，倫敦輿論一時譁然。這個消息震動了倫敦的朝野各界人士，

引起了英國人民對清朝公使館的極大不滿。公使館的門口，聚集著數以百計的同情中國革命的群眾，他們進行抗議，一再高呼「釋放孫逸仙！」甚至有些市民號召人們搗毀清使館。群眾抗議、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使清公使館的處境十分狼狽。囿於社會輿論的壓力，英國政府派遣代表向清政府駐英公使館提出交涉，首相兼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並於二十二日向清使館遞交備忘錄，要求按國際公法和國際慣例，迅速釋放私捕的國事犯。二十三日下午，清使館終於被迫將被羈囚了十二天的孫中山釋放。

當孫中山在康德黎等人陪伴下走出清使館時，受到街頭人山人海圍觀的英國公眾的熱情



孫中山被囚禁的清駐英公使館和密室。

問候，他們紛紛向孫中山揮手致意，祝賀其獲得了自由。在此期間，除了英國的報刊，美、澳、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報刊和上海的《萬國公報》、《時務報》等都轉載了有關的報導和評論，「孫逸仙」成為與封建暴政作堅決鬥爭的英雄。

倫敦被難事件，在全球引起了轟動，既使清政府的卑鄙兇殘面目大白於天下，又使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由此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傳播。孫逸仙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事績，也因此被許多國家的人所熟知，聲名大著，被人譽為「歷史中之重大人物」，受到一些被壓迫民族和主持正義人士的崇敬，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象徵人物，從而意外地提高了孫中山和他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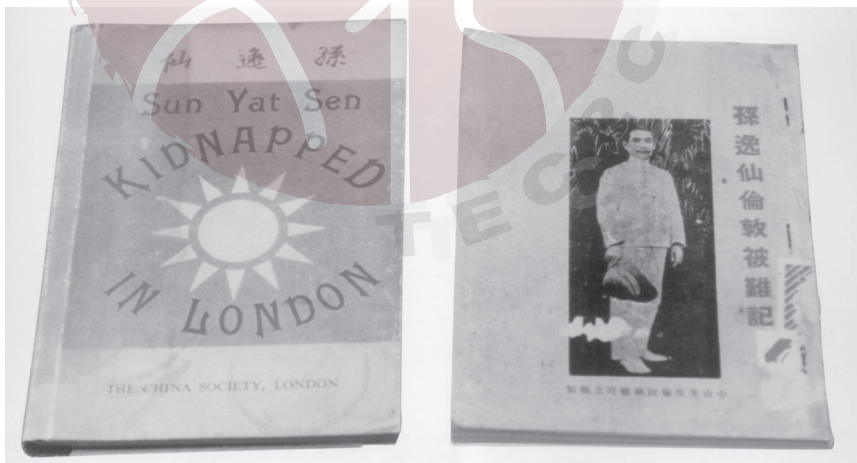
三、考察歐洲社會

倫敦被難，使孫中山深深體會中英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他被英國人看作與封建暴政作堅決鬥爭的中國英雄，一下子成了輿論和公眾注目的對象。

孫中山為滿足外國人對乙未廣州起義的探求欲，約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用英文寫了有關廣州起義的原因和經過一文。一八九七年初又用英文撰寫了《倫敦被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一書，敘述被囚禁的始末。該書在一八九七年春在這是該書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封面。英國布里斯特耳(Bristol)出版，以後又被譯成日、俄、漢等文，在海內外流傳。⁸

8 《倫敦被難記》中有意錯訛之處，孫中山後來在《建國方略》中均聲明予以訂正。

此後，孫中山在倫敦繼續居留了近一年。他雖蒙此大難，但鬥志益堅，毫不顧慮清使館雇偵探仍在對自己的日夜監視，要利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處圖書館繼續去探求救國的真理。他博覽群書，潛心閱讀和研究政治、外交、法律、經濟、礦物、農業、畜牧、機械等各方面的書籍，廣泛學習了歐美資產階級的代表著作，希望從中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經常夜以繼日、如饑似渴地刻苦鑽研，孜孜不倦地學習，有時晚上疲倦了，就伏在桌上假寐一會兒，醒來又繼續攻讀。他的學習勁頭，使一些圖書管理員和師友們既驚訝，又敬佩。康德黎回憶說：「孫中山沒有浪費一分鐘時間去玩樂，他總是不停地工作，閱讀一切學科的書籍，如關於政治、外交、法律、軍事和造船、採礦、農業、牧畜飼養、工程、政治經濟學等等，都引起他的注意，並且仔細地、堅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追求知識上達到他這樣的範圍。」



一八九七年孫中山把倫敦蒙難事件撰成《倫敦被難記》一書。

孫中山曾說過：「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夠生活。」⁹他日常生活簡樸，飲食衣著也不講究，但對讀書卻極為重視，經常手不釋卷。他愛好讀書，甚至遇到危急情況時也毫不減弱。後來有這樣一件事情：孫中山在流亡中生活十分困窘，有一次，吃飯的錢都快用完了，一些中國留學生湊集了三四十英鎊送給他。不到三天，他把這筆錢幾乎都用來買了新書，其中有盧梭的《民約論》、佛蘭克林的《自傳》，還有許多關於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書籍，他如饑似渴地專心閱讀。在孫中山看來，為了探求救中國的真理，生活苦一點沒有什麼，甚至一兩頓飯不吃也不要緊，學習比吃飯還重要。這也正是孫中山革命精神的表現。

當時，孫中山在進行學習研究的同時，也利用各種機會與各國的革命志士進行交往。他在大英博物院圖書館和幾個俄國人討論問題，互相交流看法，對「他們的計畫穩健，氣魄雄大」深感欽佩。又曾在一個叫克雷格斯的家中，與俄國民粹派在聖彼德堡所辦《俄羅斯財富》雜誌記者等多人晤談，強調必須用武力推翻清朝統治，改良主義主張是不濟事的。孫中山還在倫敦《雙周論壇》(Fortnightly Review)發表英文《中國的現在和未來——革新黨呼籲英國保持善意的中立》(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r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的長篇文章，闡述他所主張的革命理論和方案。在該文中，孫中山用大量生動具體的事實揭露了清王朝的貪污腐朽和黑暗統治，指出由於貪婪腐敗「是根深蒂固遍及於全國

9 黃昌谷：《孫中山先生的生活》。轉引自陸達節編：《孫中山先生逸語》，一九三五年陸軍印刷所發行，第五十一頁。

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他強調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德的中國人……來建立起純潔的政治」。並指出中國「全體人民正準備著要迎接一個變革」，警告帝國主義不要袒護清政府和阻撓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也是在這時期，孫中山認識了日本進步志士南方熊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年）、鎌田榮吉、田島坦等。

留居英國這段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卻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他不僅進一步研究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接觸到有關社會主義運動的學說，而且多次赴憲政俱樂部調查訪問，到愛頓農業館家畜展覽會、李勤街工藝展覽會等處參觀，考察英國社會經濟狀況。他學習西方並非匆匆吞棗，昧於國情，誠如他當時所說的，不是把歐洲文明「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因此，他比較認真地考察了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觀察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那時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正從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貧富分化懸殊，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而英國是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它具有一套以君主立憲的外殼、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富庶」的物質文明，隨著英國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它的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化。由於世界工業霸權地位的逐漸喪失，英國企業主從十九世紀末起加緊對工人階級進攻，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日益尖銳，造成了日益廣泛的工人運動。就在孫中山居住倫敦的這一時期，當地的產業工人曾舉行了持續

三十個星期的總同盟罷工，英國政府調動軍隊，實行了殘酷鎮壓。當時英國的工人運動已處於低潮，社會改良主義思想氾濫。美國人亨利·喬治(H. George，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年)的「單稅論」學說，在歐美頗為流行，風行一時。這種學說把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歸因於社會進步和發展、地租不斷高漲的結果，因此主張廢除其他一切租稅，單獨徵收地價稅，而土地漲價歸代表全體人民的國家所有，反對以暴力奪取土地。這種經濟理論，從根本上忽視了資本家榨取工人剩餘價值這一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才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它所宣稱的「土地國有」、「公用事業公有化」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問題，實際上是一種根本不觸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改良主義學說。



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孫中山發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英文一文，揭露清廷腐敗和中國面臨的社會危機，並闡明「革新黨」的任務是實行政治革命，通過改革，為掃除腐敗、發展經濟開闢道路。圖為《中國的現在和未來》(譯文)部分。

身歷其境的孫中山親眼看到倫敦的產業工人舉行總罷工遭到政府軍隊殘酷鎮壓的情景，並進一步仔細探究了其利弊得失，認識到歐美各國工業革命後儘管富強，而廣大人民並未臻於極樂之鄉，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是像他原來想像的那樣完美無缺，因而不斷有社會革命運動興起。孫中山在感觸頗深之時，亨利·喬治的學說又給他以深刻的影響，稍後明確表示「此種方法，最適於我國社會經濟之改革」。於是，孫中山意識到要挽救中國，僅僅靠西方社會的一切作為現成的榜樣是不行的，還需要探求新的道路。為免重蹈西方覆轍，防患於未然，他設想通過一些辦法避免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帶來的「禍害」，力圖防止中國將來也踏上西方國家工業化後走上歧路。他的社會經濟觀點——民生主義，就是在這時開始形成的。孫中山開始思考通過平均地權，使全國人民既能擺脫封建主義壓迫，又能避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正如他後來自述，這時「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¹⁰。不過，也應該指出，孫中山的以「平均地權」作為社會革命內容的民生主義，主要是從亨利·喬治那裡學來的。所以它一開始也就帶有不少社會改良主義的色彩。